

特稿

群策集

从长征战略机动看作战体系弹性塑造

■李健 申海良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战略机动的光辉典范。红军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辗转上万里,跨越十余省,每一次重大行动都伴随着作战方向的急剧转换和兵力部署的大范围调整。这种大规模、长距离的战略机动,检验了红军的指挥能力和战斗意志,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军事规律:作战体系弹性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变量。深入挖掘长征中蕴含的体系弹性塑造智慧,对于现代联合作战体系构建具有重要启示。

以决策弹性持续导航,在动态中修正方向

所谓弹性,是指体系在遭受压力、冲击甚至局部破坏后,能够维持基本功能并快速恢复乃至升级的能力。战争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任何预设方案都可能因战场突变而失效。作战体系必须具备快速重新规划任务的能力,以决策弹性应对不确定性,在动态中调整修正方案。

滚动决策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方式。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原计划沿湘江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湘江战役后敌重兵布下口袋阵,若按原计划行军,后果将不堪设想。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转兵贵州,在黎平会议上改变了原定方针,转向进军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类似的重大决策调整贯穿长征全程:北渡长江计划受阻便转向黔北,黔北建立根据地条件不成熟便西进云南,最终北上陕甘落脚点也是在多次比较中逐步明确的。这种“走一步看两步,打一仗算一局”的决策模式,其核心逻辑是在高度不确定性中根据实时反馈来持续修正方向。

多路备选是保持决策弹性的的重要支撑。红军决策弹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在战略主动上始终保持多条路线同时准备、择机而行的自觉意识。长征中,红军经常同时派出多支侦察分队沿不同方向抵近侦察,主力则在待机地域隐蔽集结,待各方情报汇拢、敌情态势明朗后再择路而行。这种“多条路线侦察、主力待机而动”的决策方式,确保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备选方案,不会因某一路径被敌封堵而陷入进退失据的被动境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三次重要决策调整,都深刻体现了这一决策逻辑。

现代作战体系亟需构建弹性决策机制。现代战争,战场态势以分秒为单位刷新,敌方意图可能通过认知战手段刻意遮蔽,任何预设方案都可能失效,作战体系决策链条必须具备可随战场变化而自主修正的能力。在指挥体制层面建立适应高强度对抗的弹性决策机制,当出现上级意图明确但战场情况剧变、信息

阅读提示

九十载光阴荏苒,与红军长征时期相比,今天的战争形态已发生深刻变革,但战争的根本逻辑历久弥新:不确定性是战场的永恒法则,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武器就是体系本身具备足够的弹性。其本质在于构建“生命体式”作战体系——能在打击中学习进化、在破坏中快速重组、在废墟中创造新生。当未来战场被复杂性与迷雾笼罩时,唯有具备强大弹性的作战体系,才能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定力,在极限压力下持续高效运转,在困局绝境中开辟胜利通途,并最终赢得胜利。

以组织弹性保持韧性,在消耗中保持战力

不完善的情况,下级指挥员应有权依据实际作出有效判断,自行调整行动方案。但同时必须强化指挥员的战略素养,确保方向调整始终不偏离根本目标。

作战中,作战体系不可避免会遭受损耗,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组织架构相对稳定、指挥体系有效运转、核心功能不散失,作战能力在遭受冲击后快速恢复。组织弹性能确保战斗力不因局部损失而发生断崖式下跌,始终保持体系持续作战的坚韧能力。

党的领导是组织弹性的核心所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之本、强军之魂。长征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构建了强大稳固的组织体系。政治工作通过思想教育、组织建设和群众路线,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保持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和革命信念。党支部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直达基层末梢,渗透到每一个战斗单元。红军指战员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即使建制被打散、上下级失联,仍能按政治信念和基本战术原则重新组织起自主行动。

梯次配置是组织弹性的重要形式。长征中,红军适应大规模战略机动的需要,优化指挥链条,提升指挥效能,同时实行“主力部队机动开敌—地方部队就地游击—后勤分队跟进保障”的梯次配置。主力部队承担主要作战任务,是力量体系的骨干;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负责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并提供兵员补充;后勤保障分队跟随主力移动,就地筹措物资。三重力量互为依托、协同联动,即便某一层级受损,整体力量体系仍能维持运转。

现代作战体系必须构建多层次力量结构与多样化保障体系。现代高强度对抗,一线作战力量不可避免会遭受损耗,后方保障线也可能被切断。作战体系必

须预置多种力量备份和替补方案,构建起主力、预备队、支援力量梯次配置的格局,确保关键节点遭毁后能快速补充替代。通过常态化的战备训练和过硬的战斗精神培育,塑造各作战单元具备在脱离体系支撑条件下的独立作战能力。同时还要预置多种补给渠道及替代方案,避免因某一条保障线被切断而导致体系失能。

以路径弹性开辟新路,在绝境中寻找生路

作战体系不能被单一方案绑定,不能拘泥于固定打法,必须在动态中寻找最优解。“此路不通便另寻他路”的路径弹性,是作战体系不可或缺的能力。

灵活选择路线是路径弹性的直接体现。长征中红军作战的最大特点是机动灵活。金沙江渡口被封锁便绕道皎平渡,大渡河安顺场渡河困难便分兵夺取泸定桥,草地看似绝境却硬是踩出了生命通道。每一处天险、每一处围堵,红军总能找到一条出乎敌人预料的路径。这种路径弹性表面看是地理路线的灵活,深层次看则是思维方式的解放:从不固守某一条路线,而是根据敌情、地形、天气、民情综合判断,始终保持多条路线可选。

群众路线为路径弹性提供了信息支撑。红军在行军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每到一地就深入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沿途群众提供的向导、渡船、粮食和敌军动向等,都为路径选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没有当地老船工带路,巧渡金沙江不可能完成;没有彝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彝族聚居区也难以实现。以空间换时间的灵活运用同样重要,当敌人重兵围堵某一路径时,红军宁愿绕行数百里;当时间紧迫时,又不惜代价抢占关键通道。

现代作战体系必须具备多路替代

与功能代偿能力。现代作战中,在主要作战方向受阻时能否快速切换到次要方向,在军事手段受限时能否借助非军事手段开辟新空间,在主机装备战损时能否调用民用资源实现功能代偿,在预定路线被封锁时能否迅速启用备用通道,等等,这些都将是检验体系弹性的重要标准。必须在平时就建立多路径、多方案的预案体系并定期演练验证,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切换、有效替代。

以信息弹性维持感知,在迷雾中洞察全局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体系弹性要求作战体系在信息链路被切断、情报来源被污染的条件下仍能维持基本态势感知,确保决策不因信息链断裂而瘫痪。

在信息匮乏之中保持决策能力是信息弹性的重要内容。长征期间,红军获取战场信息的手段极为有限,主要依靠侦察兵的实地勘察、沿途群众的情报提供和缴获敌军文件电台的零散信息。但依靠这些残缺不全的信息,红军指挥员往往能作出准确的态势判断。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同志通过不断截获敌军电报和俘虏口供,精确掌握敌军各部位位置和动向,从而作出精准调度。这种能力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侦察人员知道“需要什么”“该问什么”,二是指挥员能从碎片化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多渠道获取多源印证是弥补信息不足的有效方法。长征中,红军侦察兵的报告、群众的情报、俘虏的供词、缴获的文件以及电台的监听,每一条信息单独看都可能不完整甚至不准确,但多条信息汇聚在一起,相互比对印证之后,真相就逐渐显现出来,据此就能得出相对可靠的判断。这种信息处理方法在缺乏先进技术手段的条件下实现了最大限度的信息获取和利用。

现代作战体系必须构建冗余信息渠道与智能信息处理能力。信息弹性的核心,是确保感知不因单一信源失效而中断,决策不因信息链断裂而瘫痪。必须构建冗余信息获取渠道,地基、空基、地基、海基等多种手段互补备份,确保单一手段失效时其他手段能够接续;大力发展智能化的信息甄别和融合处理技术,在海量数据中快速提取关键信息、识别欺骗信息。同时还要强化指挥员在有限信息条件下的决策训练,使其在信息不完全时仍能作出正确判断。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再谈兵者之“诡”

■高凯

挑灯看剑

“兵者,诡道也”。兵者之“诡”,绝非简单欺诈,而是立足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巧妙调动、控制、驾驭对手,以最小代价达成“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根本目的。它是在风险中逐利、在辩证中应变、在创新中制胜的高超指挥艺术。

对立统一的思辨之诡。“阴阳燮理,机在其中”。作战中充满敌与我、奇与正、虚与实、合与分等矛盾范畴。兵者之“诡”,正是基于对这些矛盾范畴的深刻把握和巧妙运筹,充满辩证思维。敌我优劣利弊皆具相对性,指挥员须将辩证思维贯穿于料敌、识谋、用计等各环节。唯有全面、客观、辩证地分析敌我力量与战场环境,精准把握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方能深谋远虑,通达权变。

动态对抗的博弈之诡。“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博弈之诡,在于作战双方在激烈互动的智力角逐中不断“做局”与“破局”,形成欺瞒与反欺瞒、控制与反控制、调动与反调动的复杂斗争态势。双方无不竭力厘清“战场迷雾”,预判对手“后招”,力求因势利导、占据主动。在此斗智斗勇过程中,唯有精准洞察对手之“诡”,方能因敌制变、临机决断,真正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

“控制战”:超越攻防的“第三种作战”

■姚小锴 邹昊

观点争鸣

长期以来,战争的基本形态围绕进攻与防御两种类型展开。智能化战争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战争的内在逻辑,传统进攻与防御的二元框架日益露出其局限性。因此,一种超越传统攻防逻辑的作战类型——“控制战”应运而生。这种作战类型既包含进攻的主动性,又包含防御的稳定性,但更强调对战争全过程的塑造与掌控。

合战效效益最优化原则。高毁伤、高消耗的传统攻防作战边际效益递减。“控制战”聚焦软杀伤、精确慑控、体系破击等,能以更小代价获取更大战略收益,实现效费比最优。

“控制战”的本质特征。“控制战”融合了进攻的主动性与防御的稳定性,更强调对战争全过程的动态塑造与精准掌控。一是体系破击,聚焦关键节点控制。现代作战体系是高度耦合的复杂巨系统,“控制战”的精髓在于避免全维消耗,运用精确侦察定位、远程精确打击、网络渗透攻击、电磁频谱压制等手段,精准识别、瘫痪或控制敌指挥中枢、通信枢纽、数据节点、保障链路等体系要害,使敌陷入“失明”“失聪”“失联”“失智”的困境,从根本上瓦解其整体作战能力。二是节奏主导,实现动态精准掌控。“控制战”强调对战争进程的绝对主导权。通过灵活运用非对称优势力量,在时机选择、空间布势、手段组合上制造“突发性”“非对称性”和“跨域联动性”,迫使对手始终处于被动应对、疲于奔命的状态。采取“打停结合、虚实相济、慑战并用”策略,诱使或迫使敌方按照我方设定的“节奏”和“脚本”行动,在战略上形成压倒性优势。三是认知塑造,夺取心智领域主导。认知域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战场。“控制战”高度重视运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等综合手段,精准影响敌方决策者判断,瓦解其官兵战斗意志,削弱其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四是力量融合,统筹全域综合施策。“控制战”是国家综合实力和战略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多领域手段的高度协同与体系融合。军事力量是“控制战”的“压舱石”和“破局点”,但其效能最大化有赖于与政治施压、外交斡旋、经济制裁、舆论引导等非军事手段紧密配合,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组合拳”效应。

“控制战”的制胜关键。“控制战”以其塑造控局、跨域融合、广慑精打的特性,对作战筹划与实施提出更高要求。打赢“控制战”,关键在于精准把握三个重要环节。一是科学设定战役目的。未来战役必须立足打“军事政治仗”“军事外交仗”的定位。聚焦“有限”,即控制规模强度,充分考虑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多重制约,将作战规模、强度主动控制在合理范围。聚焦“有力”,即达成震慑

把握战与训内在逻辑

■卢雷徐辉

●训练是作战的预实践,作战是训练的终极考场,两者动态适应、循环迭代。唯有实现作战与训练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才能锻造出能打仗、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作战与训练,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密不可分。“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深刻揭示了作战对训练的根本牵引与训练对作战的坚实支撑。唯有以系统思维深刻认知并准确把握战训之间的一体性、因果性、差异性、耦合性、互促性,方能推动实战化训练提质增效,锻造部队过硬的打赢能力。

把握一体性,实现战训无缝衔接。战与训本质一体,核心在于破除“战训脱节”壁垒,解决能力生成与实战需求的矛盾,达成“按作战要求训练,按训练去作战”的深度耦合。作战是训练的终极指向,训练是作战的预实践。脱离实战的训练是“纸上谈兵”,缺乏训练支撑的作战则胜算渺茫。实践中,必须将作战需求贯穿训练全链条,从课题设置、环境构设到考核评估,均以实战标准为唯一标尺,确保训练场与战场精准对接。部队在训练中锤炼的战术素养、技术技能和协同能力,应能无缝转化为战场胜势,实现战训同频共振、一体推进。

把握因果性,恪守严训为胜导向。实战的残酷性与不可逆性,决定了训练必须以“严”立标、以“实”打底,这是战与训最鲜明的因果逻辑。战场之上,任何训练中的疏漏与标准的降低,都可能招致致命后果。强敌不会因我训练不精而“手下留情”,战争更无“补考”机会。因此,必须牢固树立“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理念,将实战中的高威胁、强对抗、快节奏、真压力场景深度融入训练,敢于在复杂天候、陌生地域、极限条件下摔打锤炼部队。要以“向死而生”的极限强度,锻造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硬核实力,用严苛扎实的训练成果对冲实战的残酷风险,确保从训到战的因果链条环环相扣、直指打赢。

把握差异性,科学规避战训误区。正视战训差异,是科学组训、避免“简单复制战场”误区的前提。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容错空间不同。实战是“一锤定音”,决策行动失误无法挽回;训练则可通过复盘推演、反复锤炼修正不足。二是对抗真实性不同。实战中敌情完全未知、瞬息万变;训练中的“敌人”多为想定构造或蓝军模拟,虽力求逼真仍有局限。三是代价承受度不同。实战必然伴随流血牺牲;训练则以“不流血、少流血”为底线,依靠科学组训与严格管控降低风险。把握差异并非“降标准”,而是要在模拟实战基础上,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如强化蓝军“形神兼备”模拟能力,增设复杂突发灾情,最大限度缩小战训落差。

把握耦合性,构建战训联动格局。战训耦合性体现为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紧密程度,存在“紧耦合”与“松耦

合”两种状态。紧耦合表现为作战需求能快速精准牵引训练调整,训练成果能及时有效反哺作战准备,形成“需求牵引—训练落实—实践检验—迭代优化”的闭合回路;松耦合则导致战训脱节、信息阻滞、联动迟滞,训练易陷“自说自话”,作战准备难免“滞后脱节”。实现战训紧耦合,关键在于建立高效联动机制:作战部门须将战场态势、敌情特点、新型作战理念等信息,及时精准转化为训练课题;训练部门则需将训练暴露的问题、验证的战法,迅速反馈至作战筹划与指挥控制环节。通过数据实时共享、信息双向流动,推动战训由“松散关联”转向“深度绑定”。

把握互促性,激活战训双向赋能。战训互促性体现为“以战领训”与“以训促战”的良性循环。“以战领训”是前提,须紧盯未来战场,明确训练方向、重点与标准,确保训练“有的放矢”。例如,针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联合作战需求,重点强化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多军兵种协同及新城新质作战力量运用等训练。“以训促战”是落点,通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检验作战理论可行性、战法打法有效性,驱动某战法方案迭代升级。如在演训中发现某战法在复杂网信体系下存在漏洞,即可针对性修订作战预案,完善应对之策。唯有坚持“战率引领、训支撑战”,方能形成二者“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持续提升部队应对复杂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核心能力,为决胜未来战场奠定胜战基石。